

山西科幻作家群：

脚踏山河 心向宇宙

杨昊宇

双塔

书画

平凡的世界 不平凡的时代
时读时新的路遥

张丹卿

山西作为内陆能源大省,悠久历史和厚重文明的赓续绵延,深刻影响着其文化生产。随着科幻小说《三体》系列获得世界性成功,刘慈欣已成为科幻文学文化符号,对一代山西作家起到带动作用和显著影响。一段时期以来,山西文学中潜藏的科幻文学潜力迸发,科幻作家队伍逐渐形成一定规模和影响力。10月14日,在山西阳泉举办的第三届刘慈欣故乡科幻文化活动周暨山西科幻作家群宣传推介活动中,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作家、编辑,围绕“以刘慈欣为代表性旗帜,张冉、灰狐、李晓虎等为中坚力量的山西科幻作家群及作品”,展开多元探讨,明确提出了“山西科幻作家群”这一说法。对于“山西科幻作家群”进行概念界定、由来梳理和作家作品分析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黄土地滋养创造力

山西科幻作家群最显著的特征在于,山西这片黄土地与浩瀚星空本不搭边却和谐统一的强烈矛盾张力。山西表里山河的封闭险要地理环境,反而催生了人们望向更遥远星空的内心冲动。同时,悠久的晋商文化蕴含的开拓精神、数据思维和全局视野,也为科幻创作提供了丰厚滋养。

山西是能源重镇,拥有深厚的工业文明和历史积淀。这片土地上的作家,天然地对工业结构、时代力量、生存资源、环境伦理等主题有着深刻的体悟。而这些领域正是科幻作品大量呈现的部分。无论是刘慈欣笔下宏大的工程叙事,还是其他作家对基层社会的关注,都带有一种坚实的、近乎粗粝的现实质感。长期的煤炭工业和重工业建设,塑造了一种务实、严谨、注重结构与系统的工程师思维方式,这为人文与科技相结合的科幻文学提供了天然的温床。以刘慈欣为代表的许多山西科幻作家都具有理工科背景。他们的故事常常以解决一个具体的、宏大的技术问题为核心,叙事逻辑清晰、结构严谨。身处能源大省,山西科幻作家普遍对“生存与毁灭”议题异常敏感,他们的故事常常设置在各种极端环境下,探讨文明在资源枯竭、环境恶化或外部威胁下的挣扎与选择,带有一种强烈的忧患意识。故而,山西科幻作家群作品在这种冷硬的科技外壳下,包裹的往往是对人类整体命运的终极关怀、对道德的叩问以及对文明存续的忧思。

星海征途的引领人

刘慈欣是山西科幻作家群的灵魂与旗帜。他的成功,不仅让山西科幻文学走向世界,也重新定义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格局。他基于现有的科学理论,运用其卓越的想象力,科学推演合理的未来,个体角色往往服务于更宏大的理念和情节推进,以整个文明、整个星球为单位进行叙事。

庞大的煤矿井架、轰鸣的发电厂、绵延的铁路网、巨大的工业设备,这种环境深刻地塑造了刘慈欣的审美取向。《流浪地球》中那一万一千座比珠穆朗玛峰还高的地球发动机,遍布全球,喷射着巨大的等离子光柱。这种想象的核心是一种充满了力量感、钢铁的冰冷感和近乎粗暴的工程逻辑,更是山西重型工业景观在宇宙尺度上的镜像投射。《三体》中的

我们在中国诗仙李白的敬亭山、庐山、天门山、打从天上来黄河之间,一遍遍地看见了诗歌;也从谢灵运的“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中,看见了诗歌里的美术,听见了诗歌里的音乐。当然,从西方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拜伦的河流、山岗、果树园里,我们也能真切感受到诗歌的来回奔跑。

也就是说,山水是诗歌。这种演化,应该是很自然的。在美丽与自由的范畴里,她们天然而牢固地结合在了一起。

一条山溪就是一句诗行,一块鹅卵石就是一个标点。中国古代不兴标点,那么,水的转弯与风的戛然而止就是诗歌的节奏与韵律。

我们看见好山好水在诗人的笔下显得那么活泼,那么有精神,简直是一种出神入化。即便是岑参的“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的边塞荒凉,也是诗歌里的一把难得的骨头。

感谢中国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他用他的脚与手,巧妙地把最有生气的中国山水搭建成中国诗歌。

而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尽管山水是诗歌,但诗歌不是山水,或者说,山水诗里面,不是山水本身。

李白就是榜样,他的敬亭山就不仅是敬亭山,我们能读出面对官场政治的愤懑与对时政的褒贬。陶渊明也是榜样,他的“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是话中有话,他的山水之纯净与美妙,与人间之樊笼互为反义。

所以,我们在一头钻入诗人给我们布置的山水之间、细细观赏诗人的山水工笔之时,也需同时领略诗人感情的全部,这个人是不是有一部分笔墨走出了山水之外?

其实,山水诗里有太多的政治、爱情、处世哲学、佛道感悟。山水诗是不纯净的,山水诗里有许多杂质,就是这些杂质,犹如是绿色山岗内部的那些粗粝的岩石,托起了整座山的脊梁,使大山成为大山。

再反过来说,借一方山水,抒诗人自己想抒的感情,固然是常态,但也要掌握一个度,不能只讲骨头不讲皮肉,轻忽了眼前的这一方好山好水。

也就是说,这一方山水的特点、格局、性灵、魅力,还是要尽可能地体现于诗作,争取做到真正的情景交融,让读者既对你诗作里呈现的一方山水表现出向往,也对你精神领域里的那方山水表示出理解或者共鸣。

把握好这样的度,当然难,但路径也是存在的。前人有榜样,经典有范例,我们老老实实学就是了。我是山水诗鼻祖谢灵运的浙江老乡,为勉励自己我今天冒昧高攀一下,我想说的只是这样一个意思,我愿意在今后的山水诗写作中为此倍加努力,既已有人称我为“行吟诗人”,我可不能辜负了我的双脚曾经所涉的所有秀山丽水。

从这个角度说,山水诗到了最后,仍是具体的一方山水。

(黄亚洲,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诗刊》编委。)

“万有引力号”飞船同样庞大而又精密,体现了一种重工业式的、务实的功能主义美学。正像山西连绵的矿山和重金属机械一样,充满了可靠、坚实的力量。《乡村教师》是山西传统文学与科幻文学交融的代表,是“黄土与星空”的优雅交响乐,为山西乡土文学传统赋予了刘慈欣开创的科幻叙事魅力。

同时,他把能源转型的集体忧患意识,升华为对整个文明命运的哲学思考:在浩瀚宇宙中,人类文明就像一个依赖有限煤炭的矿区,必须为生存而思考。《微纪元》《赡养人类》等短篇佳作都从不同角度探讨了在资源极度匮乏环境下,人类社会的形态和选择。

想象边界的探索者

张冉善于将历史纵深注入未来叙事。《野猫山——东京1939》将抗日空军的悲壮与时空隧道结合,赋予历史一种科幻的传奇色彩。这种对历史的执着与重新打捞,源自山西遍地的文化资源。他的科幻时间,不是单向奔向未来,而是常常与过去交织在一起。山西儿女对土地和家园有着极深的情感依附。张冉的作品,无论场景如何科幻,其情感核心常常是富有人文温情的。《回家》中父亲与儿子“在路上”的跋涉与“回不去”的怅惘,与山西历史上“走西口”的悲壮一脉相承。它书写的不仅是地理上的归途,更是文化身份和精神原乡的归还。《起风之城》中主人公对那座灰蓝色、衰败的工业城市的复杂情感,寄托着淡淡的乡愁。

灰狐的长篇小说《固体海洋》不仅是一部科幻小说,更是一场关于人类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预警与哲学思想实验场。环保意识对灰狐的创作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塑料不再是漂浮物,而是成为了海洋的“新地质层”,改变了海洋的物理属性和生态系统。这种设定彰显了山西人对于大地的挖掘和

探索。小说中,人类试图用科技解决科技带来的问题,但这本身可能孕育着更大的危机。

李晓虎是山西少儿科幻作家的代表,善于将厚重的历史文化资源与未来想象相结合,在科幻叙事中融入对现实问题的深刻反思。他创作的《孙悟空的跟屁猴》,将《西游记》这一经典文本置于“后人类”语境中,以科幻手法解构神话,既保留了中国古典文学的叙事魅力,又赋予其现代科技伦理的思辨维度。这种“浅语深意”的写作方式,是对山西科幻文学现实关怀传统的延续,为儿童阅读埋下了哲学思辨的种子。

叙事规则的挑战者

近年来,山西省作家协会、阳泉市文联等推出了一系列扶持策略,孵化出一大批更为年轻的新生代科幻作家。兔八的创作证明,那种源于黄土地和重工业的、对生存与发展的深切关怀,对宏大结构的把握,并不必然以严肃、悲壮的面貌出现。它完全可以与网络时代的幽默、解构、宅文化相结合,生长出一种兼具宏大想象力与轻盈表达的新科幻风格。木羽用童趣、幽默和温情的诗意图,包裹并软化冰冷的宇宙法则,实现对宏大叙事的个人注解。关乎人类命运的未来叙事,也可以从一个女孩的卧室、一只狗狗的早餐开始。王云轩的《重生之愿》生态伦理美学突出,宛若写给人类文明的、充满忧思的生态寓言。而其作为在山西出道的非山西籍青年作家,彰显了山西科幻作家群的开放包容与吸引力。

山西科幻作家群,已然成为中国文学的一个独特现象。他们从厚重的黄土高原走来,却将人类的想象力推向了宇宙边缘。正如刘慈欣所言:“我们更应该致力于创造那些山西传统文学文化中没有的新的东西,而不是把过去的传统当成负担。”山西科幻作家群同时面临机遇和挑战。



微光成炬

——《南京照相馆》的叙事美学

郭子涵



《南京照相馆》海报

近年来,抗日战争题材影视作品层出不穷,如何将史实的严肃性、特殊性与当下的时代性结合?此类题材的标准与边界是什么?如何讨论道德、伦理与文化的关系,从而以多元化叙事手法拓展电影美学的边界?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电影《南京照相馆》为例,探讨其在抵达历史真实与探索艺术建构方面作出的努力。

不同于传统战争片的宏大叙事,《南京照相馆》以“金陵照相馆”这一微观叙事空间为切口,讲述了一群手无寸铁的普通老百姓在乱世艰难求生的故事。

以一段历史横截面见微知著地反映战争对人性的摧残、对生命的剥夺。影片中的小人物有别于那些具有刚强战斗意志的英雄主人公,他们以自己的力量和方式逐渐觉醒、成长与抗争。

主人公苏柳昌是一名邮差,在躲避日军追击时误打误撞进入一家照相馆。他在历经种种逼迫与恐惧,看透日军的残忍与伊藤的伪善后,由求生转为赴死。蜷缩于照相馆地下室避难的老金是一个有原则有判断力的聪明人,在大是大非面前保持清醒,想办法揭露日军暴行。老金和苏柳昌由争夺保命字条,到携手共渡难关,再到互劝对方拿着通行证离开,两人虽曾胆怯懦弱,但在逆境中经历生死考验,生出大无畏的勇气决心。他们

是平凡老百姓的缩影,电影便是以小人物见

证大历史的视角演绎个体成长与国家叙事的同构,显示出现实主义影视作品极强的感染力。

影片对汉奸王广海这一特殊形象的处理,既表现他贪生怕死、自私自利,也展现他对日本人屠杀民众有愤怒,但为了苟活选择麻木自己,最终得到应有报应。这一叙事处理延续了中国现代文艺国民性批判的传统。

对女性角色的刻画极具人文关怀。影片多次暗示日

军对林毓秀的侵犯意图,镜头对准施暴者嘴脸,避免直接

呈现女性痛苦。这种暗示、留白、含蓄的叙事处理,尊重女性,更具艺术张力。

结尾,林毓秀和老金的幼子劫后余生来到安全区,黑暗无序的现实照进一丝光明,令无望的生活泛起希望的涟漪。

在艺术处理中,弱小的婴童象征希望,他在众人的

保护下走向“重生”的未来,彰显出蓬勃旺盛的生命力,寄寓着中国人民休戚与共、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理想主义

美学色彩。

抗战题材电影的创新表达,对于激发观众民族认同感和爱国情怀发挥重要作用。要谨防对侵略者“不经意”

的美化与泛化的人道主义同情。《南京照相馆》牢牢站在

中国人民受难视角,塑造伊藤这样一个可信的日本军人文形象。

伊藤出场时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角色,他仿佛彬彬有礼、谦和腼腆,并未手握刀刃。然而相机成为他手中的武器,他按上级要求记录日军“战果”,曲解“仁义礼智信”的内涵,倒反天罡,把泯灭人性的罪孽推到受害者身上。结局中,伊藤被硫酸殴打变得丑陋,虚伪的面具终于扯下。《南京照相馆》的电影语言具有直观性,画面富有冲击力,对这段历史的呈现克制冷静,又颇具力量。

影像这一媒介在建构大众有关南京大屠杀的集体记忆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伊藤看重他记录下的日本人的“荣耀”时刻,看到老金照相馆里南京百姓的照片,认为“这些都不重要”。

影片在此埋下伏笔,结尾时,伊藤的底片全都被调包,这些反映南京百姓生活瞬间的照片成为压垮伊藤的最后一根稻草。在老金南京口音的介绍中,影片出现一幕幕现实与底片交错的画面,比如“老寿星,他们买衣服,买胭脂,买喜糖,摆席宴客”,画面由老夫妇幸福的家庭照,切换成老夫妇在大街上逃难;“喜得贵子,人丁兴旺,宝宝不要怕,看镜头”,画面为市民婴儿满月照,切换成婴儿被挑在箩筐中,混入逃难的人群……

前南京城繁华喧嚣,人民生活细碎繁复、岁月静好,大屠杀让原本的生活戛然而止,无辜生命被战争机器毁灭。

影片在快节奏的时空对比中制造了断崖式的落差感,使观众被撕扯的痛楚情感达到顶峰,充满同情与慨叹,引发反思。

相机是串联影片叙事的关键物品,照片令历史尘封的

记忆苏醒。日本人的胶卷被调换后,经由照相馆避难所几人的守望相助,以悲壮的个人牺牲完成真相的传递和揭露,成为审判罪犯的证据。在影片结尾,林毓秀和成长为少年的老金的孩子,站在人群中注视着日本战犯处决现场,她举起相机捕捉到子弹射入战犯头颅的瞬间,这是受压迫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正义的宣告。

相机是串联影片叙事的关键物品,照片令历史尘封的

记忆苏醒。日本人的胶卷被调换后,经由照相馆避难所几人的守望相助,以悲壮的个人牺牲完成真相的传递和揭露,成为审判罪犯的证据。在影片结尾,林毓秀和成长为少年的老金的孩子,站在人群中注视着日本战犯处决现场,她举起相机捕捉到子弹射入战犯头颅的瞬间,这是受压迫人民的觉醒,也是对正义的宣告。

在逃离南京城的前夜,苏柳昌、老金一家、林毓秀在照相馆内拍下团圆照,背景是祖国的大好河山。此情此景藏有影片的叙事基调,影片不是为了宣扬仇恨,而是为了展现中国人民的民族气节和必胜信念。影片在小人物群像的塑造中,展现对个体生命尊严的尊重,深刻挖掘出抗战精神的内涵。

作为陕西黄土高原的文学赤子,路遥用笔尖丈量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深邃沟壑。当我们以今天的眼光回望这位作家的创作生涯时,会发现他的书写始终浸透着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与农民后代的坚韧底色。这种双重身份赋予他的作品独特的穿透力——既能俯瞰时代洪流全景,又能触摸个体生命的肌理。

1949年出生于陕北清涧县的路遥,童年的记忆里是饥饿与困顿的交织。12岁因贫困辍学务农的经历,让黄土地的粗粝与农村生存的艰辛深深烙在他的骨血中。这种双重境遇使他在创作时,总能精准捕捉城乡差异:当城市青年畅谈与远方时,他的笔下更多浮现的是孙少平们在工地啃着黑面馍的生存焦虑。路遥曾在延川中学的油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保尔·柯察金的革命理想与他作为农民后代的现实处境形成强烈对冲。这在其代表作《人生》中具象化为高加林的进退两难——是坚守农村故土还是追逐城市幻梦?正如一位评论家所言:“路遥的人物总在进城与返乡的悖论中挣扎,这恰是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社会的生动缩影。”

路遥的创作绝非简单的苦难展览。在《平凡的世界》创作笔记中,他写道:“要写出生活的热度,而不是寒气。”这种独特的现实主义立场,使得他的农村书写既有生活的重量,又不失生命的韧性。当大多数知青作家还在哀叹命运多舛时,他已经将镜头对准了田润叶们在传统婚姻制度下的觉醒抗争。

城市书写方面,路遥展现出罕见的清醒认知。不同于某些作家对都市的浪漫想象,他笔下的省城铜城笼罩着工业文明的冷峻色调。孙少平在矿井下的挣扎不仅是身体上的磨难,更是城乡文化冲突的心理映射。

路遥的创作始终扎根于现实土壤,却又具有超越时代的前瞻性。上世纪70年代末,“伤痕文学”盛行时,他已开始关注改革中的小人物命运;上世纪90年代初,当市场化浪潮席卷全国,他却聚焦农民工的生存境遇。这种创作定力源于他对土地与农民根深蒂固的眷恋,更彰显着知识分子的良知担当。

在“陕军东征”的文学热潮中,路遥选择逆流而上。通过《平凡的世界》建构起完整的社会生态系统:从双水村的宗法关系到省城的官场生态,从集体生产到个体经济萌芽,每个细节都折射着时代转型的迷茫与希望。有学者曾说:“路遥构建的不是一个封闭的文学世界,而是改革中国的微观样本。”

作为大学生,重新阅读路遥作品时,我们会被那个倔强的文学身影深深触动。在物质诱惑无处不在的今天,孙少平在矿井下读书的场景依然震撼人心——那是对知识尊严的坚守,更是对精神家园的追寻。路遥教会我们:文学不应止步于现象描摹,更要揭示表象之下的精神图谱。

路遥的创作困境对当代写作者具有警示意义。他坚持“像牛一样劳动,像土地一样奉献”的准则,这种朴素的文学信念恰是对抗浮躁的良药。

今天,路遥的文学遗产愈发显现出超越时代的价值。他以双重身份的独特视角,为城乡议题留下不可替代的文学注脚;他用扎根黄土地的现实主义精神,为当代中国文学树立起精神的丰碑。作为“数字原住民”的我们,在虚拟与现实交织的今天,更需要从路遥的笔触中汲取力量——那是对真实的热爱,对土地的深情,更是对生命尊严的执着守望。当我们在学习过程中攻坚克难,在乡村支教播撒知识火种,路遥笔下那些倔强的魂灵始终与我们并肩前行,提醒着我们:真正的文学永远生长于现实的土壤,绽放于心灵的深处。

